



魯迅先生
誕生八十周年
紀念大會

1961.9.25. 北京

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紀念大会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作家协会

主 办

1961 北 京

主席团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西林
王治秋
邓颖超
包尔汉
刘白羽
齐燕铭
吕驥
李德全
陈毅
陈克寒
吳晗
吳組緤
林楓
张奚若
季方
赵树理
范文澜
袁水拍
徐冰
許广平
曹禺
萧长华
楚图南
臧克家
戴爱蓮

川島
王芸生
叶圣陶
老舍
艾蕪
阳翰笙
严文井
李霁野
陈半丁
陈其尤
吳玉章
何其芳
林默涵
竺可楨
周揚
胡乔木
茅盾
夏衍
徐伯昕
許德珩
曹靖华
馮至
楊之华
蔡若虹
薩空了

王士菁
王昆仑
叶浅予
刘开渠
艾思奇
沈鈞儒
李權
陆定一
陈白尘
陈叔通
吳作人
何香凝
张天翼
邵力子
周立波
胡愈之
唐弢
馬叙倫
徐特立
郭沫若
萧三
黃炎培
楊秀峰
蔡楚生

王任叔
邓拓
田汉
刘宁一
孙伏园
宋庆龄
李四光
陈垣
陈伯达
阿英
吳冷西
欧阳予倩
张光年
邵荃麟
周建人
胡耀邦
韋懇
馬思聰
徐萌山
康生
萧华
傅鍾志
廖承志
謝冰心

在魯迅先生誕生八十周年 紀念大会上的報告

茅 盾

今天，我們隆重紀念魯迅誕生八十周年。八十年，在人類歷史上，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是，在中國，却發生了一個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人民的三大敵人，曾經像三座大山一樣，沉重地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人民的頭上，現在，這三座大山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被中國人民勝利地推倒了！魯迅，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和偉大作家，喚醒中國人民反抗、推倒這三座大山的先驅者之一，他的畢生精力都是貢獻給這個偉大而崇高的事業的。在他的八十誕辰的時候，我們能夠在永遠掃除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的祖國，在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干劲沖天，建設着社會主義的時期，來舉行紀念，是應該引以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魯迅于地下。

一八八一年上距鴉片戰爭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國的失敗僅十五年。這時期，由於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勝利，對外屈伏而對內凶橫的滿清皇朝的政權，獲得暫時的穩定，自詡為“中興”。這以後的十年間，一度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船堅炮利所震懾的滿清統治集團把“興辦洋務”視為自己的續命湯，陸續舉辦了一些兵工廠、水師學堂，派遣留學生學習海軍和航海，開辦一些電報局，築了幾條短程鐵路，也開辦了若干民用廠礦。這樣就展開了中國歷史上官僚資本主義的第一頁。這十年間，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陸續在加緊和擴大。尤其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以教會為據點，以傳教士為先遣隊，從沿江沿海地區深入到內地，辦報，辦學校，辦出版社，對廣大中國人民進行奴化教育。對於帝國主義的日益加緊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滿清統治集團不但未加抵抗，反而開門揖盜，助紂為虐。

然而，“興辦洋務”既不能增加滿清皇朝對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進中國人民的窮困落后狀態；以官僚集團為主體所興辦的“洋務”反而便利了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增加了人民的負擔。帝國主義的加緊和擴大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當然也進一步激起了中國廣大人民反帝鬥爭。太平天國失敗以後，捻軍以及西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武裝起義，都給予滿清皇朝以沉重的打擊，而反帝國主義、反清、反封建的人民運動——教案、農民起義，也此起彼落，連年不斷，遍及全國各省。就這樣，滿清統治集團所自吹自擂的“中興大業”，轉眼間已成一場春夢。

这些历史背景，对于童年时代的鲁迅，不能不给与深远的影响。

此后，正当鲁迅的少年、青年时期，历史大事件接踵而来：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反帝武装斗争。这几桩历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运动，青年的鲁迅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救中国的事业。但是，那时候的鲁迅，已经看到文化革命、思想教育的极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时候的活动主要在于开展一个新的文化、文艺的运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并鼓吹了爱国的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的欧洲大诗人和他们的思想，在《域外小说集》中又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容諱言，鲁迅在当时也象同时代的许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然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换言之，辛亥革命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鲁迅认识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经十分苦闷。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从此看到了救中国的康庄大道，鲁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须经过艰辛的战斗的考验。一九一九年以后十年间鲁迅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即是明显的证明。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会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鲁迅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附带说一說，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鲁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我曾经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今天我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解还跟那时一样，因而也觉得没有再炒冷饭之必要）。在这里，我只打算谈一谈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活动和提高修养具有实际意义的三个问题。这就是：①鲁迅作品如何服务于整个革命事业？②鲁迅作品的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③鲁迅的“博”与“专”。

鲁迅的文学活动开始于本世纪初（约在一九〇三年前后），而他的革命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却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题小象》诗（作于一九〇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决心。但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却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式开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这是中国革命文学的第一燕，也是鲁迅的革命文学的第一朵花。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魯迅毫不隱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傾向性，和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的目的性，在這篇“自序”中，他又寫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在這裡所說的“遵命文學”，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學，也就是反映了人民鬥爭和時代精神的文學。文學是革命鬥爭的武器之一，魯迅最善於靈活地運用這個武器從多方面來為革命的政治服務。和《狂人日記》同時，魯迅開始了雜文的寫作。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這個文藝武器。從當時發表在《新青年》的隨感錄，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從各個角度，運用各種題材，或冷嘲熱罵，或大聲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時候的以各式各樣嘴臉出現的封建妖孽和洋場惡少（買辦意識）。這些雜文，以生動的極富於形象性的筆墨，表達了鞭辟入里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內容，給當時的反動思想以致命的打擊，給當時的追求真理的廣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啟發。

在一九二五年，魯迅曾經莊嚴地熱情地宣布：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堅決反對任何阻礙我們進步和發展的事物，就是魯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環，而也是貫串在魯迅的文學活動的一根紅綫。

魯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學活動，都跟當時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當時的階級鬥爭，緊密地聯繫着；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國革命運動的壯闊波瀾，然而，同時也反映了作為當時革命運動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戰綫上的時而正面交鋒時而迂迴突襲的長期而艱巨曲折的鬥爭。鬥爭的鋒芒所指，常因時因地而不同。魯迅是最善於辯證地看問題的。他曾經尖銳地指出：

“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却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虫，……”（《‘偽自由書’後記》）

他反對“為藝術而藝術”，指出這不過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消閒”文學的別號；但他也反對不講求技巧的“標語口號式”的作品。“標語口號式”的“革命文學”是缺乏感染力的，是對於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簡單化、庸俗化的理解和作法，實際上達不到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他曾經強調指出：

“我以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則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噴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革命文学》）

魯迅很重視文学艺术的特征，以及把文艺作为手段为政治服务的特性，并严格地把文艺和其他的革命宣传工具区别开来。在《文艺与革命》（一九二八年）中，他写道：

“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魯迅这些对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如何服务于政治的見解，在今天，对于我们也有深刻的启发作用，而他的作品，則提供了文艺如何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的典范。他的题材范围非常广闊，他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的小说数量不多，然而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刻画了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他的深刻的思想是和他所塑造的生动的形象密切結合的。他的杂文的天地則更为广闊，古今中外，宇宙之博大，蠅蚋之微小，兼包并蓄，然而或直接或间接，都为革命服务，都为文化革命之扩大与深入累积了资源，都給年青的革命的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魯迅在談到他自己的創作时，曾經說到某些外国古典作家对于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里，依稀可見。但《狂人日記》不但寄托更为深远，而风度、气派，依然源出本土，非同移植。他說自己开始創作之际，“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此則不但是自謙之辞，同时也是坦白地告訴我們：取人之长，以丰富自己的血肉，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至于繼承和发展本国的优秀传统，魯迅曾屢次強調，而他的作品便是他身体力行的証据。魯迅在繼承和发展旧传统方面，目光四射，取精用宏，不限于我国古典文学，亦且旁涉其他姊妹艺术，例如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九三三年）中，他說过这样的话：

“中国旧戏上，沒有背景，新年卖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現在的花紙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

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形象地說明了他对于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优秀遗产所抱的态度。他說：

“我們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

沒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沒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

他反对保守，反对故步自封。他提倡有分析有批判地創造性地繼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其目的则是为了推陈出新。他說：

“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須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論‘旧形式的采用’》）

正因为他重視“拿来主义”。他把大半精力付給了翻譯和介紹外国的进步文学艺术。而且，在国民党反动統治的白色恐怖之下，翻譯和传播革命文艺理論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工作，有它极其巨大的政治意义。他曾把这种工作比喻为希腊神話中的普罗美修士从天上窃火給人間，是“偷运軍火給起义的奴隶。”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几乎和他的創作活动相始終。今年即将开始出版的《魯迅輯录古籍丛編》三大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所蒐集的古代艺术遗产，如石刻画象等，今后也将系統地进行整理和出版。）

“拿来主义”对于魯迅作品的独特风格的形成，無疑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以驅使笔墨的技法而言，魯迅的文学語言同我国古典文学（文言的和白話的）作品有其一脉相通之处，然而又是完全新的文学語言。在这些新的因素中，（例如句法和章法），依稀可見外来的影响，然而又确是中国气派，确是民族形式——当然，这在我国民族形式的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頁。无论是他的小說、杂文、題詞、乃至書信，一眼看去，便有他的个人风格迎面扑来。这种风格，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如果要勉强作概括的說明，我打算用这样一句话：洗炼，峭拔而又幽默。

但是，統一的独特的风格只是魯迅作品的一面。在另一方面，魯迅作品的艺术意境却又是多种多样的。举例而言：金剛努目的《狂人日記》不同于談言微中的《端午节》，含泪微笑的《酒楼上》亦有別于沉痛控訴的《祝福》。《风波》借大时代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片段，指出了教育农民問題之极端重要，在幽默的笔墨后面跳跃着作者的深思忧虑和热烈期待。《涓生的手記》則如万丈深渊，表面澄靜、寂寞，百无聊賴，但透过此表面，則龙蛇变幻，跃然可見；这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概括了当时的不滿于现状、正待洒开大步、別寻出路，而又思想上矛盾重重的广大知識青年的精神状态的。

《故事新編》为运用历史故事和古代传说，（这本是我国文学的老传统），开辟新的天地，創造新的表現方法。这八篇小說各有其运用史实，借古諷今的特点，但仍有共同之处，即：取舍史实，服从于主题，而新添枝叶，絕非无的放矢。《奔月》一篇，平空添了烏鴉，固有所諷；《采薇》却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鹿授乳、叔齐有杀鹿之心、妇人譏夷齐，均見注《列士传》，《古史考》，《金樓子》等書，阿金姐这名字是魯迅給取的），旧說已足运用，故毋須再驕幻

想。至于艺术境界，八篇亦各不同；例如《补天》詭奇，《奔月》雄渾，《铸剑》悲壯，而《采薇》詼諧。

大致說来，魯迅在他的杂文中，运用了另一种艺术表现方法。这种表现方法，服从于杂文的政治任务，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統一。魯迅称杂文为“匕首”或“投枪”，脫手一擲，能致敌人于死命。他卓越地完成了自己所规定的任务！然而“匕首”或“投枪”，倘就其作用而言，固然可以概括魯迅的絕大部分的杂文；但魯迅杂文的艺术手法，仍然是迴黃轉綠，掩映多姿。他的六百余篇、一百万字的杂文，包罗万有，除了匕首、投枪，也还有发聋振聵的木鐸，有悠然发人深思的靜夜鐘声，也有繁弦急管的縱情欢唱。我們說魯迅的杂文是迅速反映现实的战斗性极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此所謂战斗性，固然指对敌人的斗争，同时也指对自己陣营內的錯誤傾向的斗争，对迷路的朋友們的不妥协的坚持原則性的忠告，以及对中間分子的搖擺不定的針砭。在对敌斗争时，魯迅用的是匕首和投枪，但在对内、对友、对中間分子时，魯迅有时用醒木，有时也用戒尺，有时則敲起警鐘；故就魯迅的杂文而言，片面性和簡單化的說法是不符合于实际的。

魯迅的生活經驗是极其广泛而丰富的，这在他的作品（包括杂文）中可以看到。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象我們今天那样接近工人群众，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工人阶级，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沒有共同之处；不，事实不是如此。所以然之故，在于魯迅对当时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工人等等）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十分熟悉的，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魯迅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从战斗的經驗中，認識了人类（包括中国人民）的前途依靠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且正象他在一九〇一年《自題小象》說的“我以我血荐軒轅”，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至呼吸停止的一瞬前，他坚决不移地認清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他无时无刻不为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在三十年代，魯迅所走的道路，不仅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具有典型的意义，对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說来，也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在六〇年代，这也依然具有典型的意义：真誠地謀求祖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必将走着象魯迅那样走过的道路。

除了广泛的生活經驗，魯迅的學問也是极其渊博的，这表现在他的学术性著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杂文中。我在前面提到过，《故事新編》中的《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說就可以窺見魯迅的博覽。而他的全部杂文，則展示了他对于历史（中国和外国的）、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广博的知識和深刻的理解。正因为具有这样广博深厚的基础，所以魯迅的

杂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上可以說是前无古人的。“博”与“专”，在魯迅作品中的辯証的統一，对于我們也是学习的典范。

同志們，朋友們！魯迅誕生已有八十週年了，他离开我們也快到二十五週年了。在紀念他的八十誕辰的时候，我們的文学艺术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領導之下，已經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我們已經基本上肃清了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服务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文艺。这一切反动的文艺，是魯迅所痛恨并終生与之搏斗的！

我們已經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的革命的新文艺。在党的阳光照耀之下，在群众的土壤之中，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象雨后春筍一样，不断地湧現出来，形成了万紫千紅、百花爭艳的局面，而不是魯迅当年曾經慨叹过的“寂寞新文苑”了。这一切，也正是魯迅所夢寐以求并終生为之奋斗的！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之下，十二年来，我們已經遵循着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确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去年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已經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然而我們决不应满足于已經取得的成就。我們的文学艺术工作还赶不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飞跃发展的形势。我們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同时也还存在着不少問題；上面提到的貫串在魯迅的全部文学活动中的三个方面，也正是我們今天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急待解决的三个問題。讓我們以更認真地更深入地学习魯迅，来紀念魯迅；讓我們进一步貫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更快的发展和更大的繁荣。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領導之下，在全国人民的期待鼓励之下，我們有信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提高我們作品的質量，完成党和人民付託給我們的任务。

СОСТАВ ПРЕЗИДИУМА

Дин Си-линь	Чэнь Бань-дин	Тан Тао
Чуань Дао	Чэнь Бай-чэнь	Вэй Цюе
Ван Ши-цзин	Чэнь Бо-да	Юань Шуй-по
Ван Жэнь-шу	Чэнь Кэ-хань	Ся Янь
Ван Е-цю	Чэнь Ци-ю	Ма Сюй-лунь
Ван Юнь-шэн	Чэнь Шу-тун	Ма Сы-цун
Ван Кунь-лунь	А Ин	Сюй Бин
Дэн То	У Хань	Сюй Бо-синь
Дэн Ин-чао	У Юй-чжан	Сюй Тэ-ли
Е Шэн-тао	У Цзо-жэнь	Сюй Мэн-шань
Е Цянь-юй	У Лэп-си	Сюй Гуан-пин
Тянь Хань	У Цзу-сян	Сюй Дэ-хан
Бурхан	Хэ Ци-фан	Го Мо-жо
Лао Шэ	Хэ Сян-нин	Кан Шэн
Лю Кай-цюй	Оуян Юй-цянь	Цао Юй
Лю Нин-и	Линь Фэн	Цао Цзин-хуа
Лю Бай-юй	Линь Мо-хань	Сяо Сань
Ай У	Чжан Тянь-и	Сяо Хуа
Ай Сы-ци	Чжан Гуан-нянь	Сяо Чан-хуа
Сунь Фу-юань	Чжан Си-жо	Фэн Чжи
Ци Янь-мин	Чжу Кэ-чжэнь	Хуан Янь-пэй
Ян Хань-шэн	Шао Ли-цзы	Фу Чжун
Шэнь Цзюнь-жу	Шао Цюань-линь	Чу Ту-нань
Сун Цин-лин	Цэн Фан	Ян Чжи-хуа
Люй Цзи	Чжоу Яп	Ян Сю-фэн
Янь Вэнь-цзин	Чжоу Ли-бо	Ляо Чэн-чжи
Ли Хуа	Чжоу Цзянь-жэнь	Цзан Кэ-цзя
Ли Сы-гуан	Чжао Шу-ли	Цай Жо-хун
Ли Дэ-цюань	Ху Цяо-му	Цай Чу-шэн
Ли Цзи-е	Ху Юй-чжи	Се Бин-синь
Лу Дин-и	Ху Яо-бан	Дай Ай-лянь
Чэнь Юань	Фань Вэнь-лань	Са Кун-ляо
Чэнь И	Мао Дунь	

ДОКЛАД НА СОБРАН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М 8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ЛУ СИНЯ

Мао Дунь

Сегодня 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здесь, чтобы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 отметить 80-летие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Лу Синя. 80 лет — в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это всего лишь одно мгновение, однако за это время в Китае произошли огромные перемены, потрясшие небо и землю.

Три больших враг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 империализм, феодализм и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как три большие горы, тяжелым бременем лежали на плечах народа полуфеодального и полуколониального старого Китая. Сегодня же эти три большие горы уже сброшены победив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 народом, которым руководи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Именно этому великому и благородному делу посвятил всю свою жизнь Лу Синь — великий борец и вели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один из тех пионер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или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род, призывали его сопротивляться, свалить эти три большие горы. Мы отмечаем 80 лет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Лу Синя в такое время, когда наша Родина навсегда освободилась от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феодализма и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когда в ней восторжествовали свобода и демократия, когда народ всей страны с непоколебимой волей и всепобеждающим энтузиазмом строит социализм. Этим мы должны гордиться, этим мы можем утешить покойного Лу Синя.

1881 год. . . Прошло 40 лет после первой опиумной войны и всего 15 лет после поражения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То был период, который Цинская династия самодовольно называла «периодом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так как власть этой династии, преклонившей колени перед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свирепствовавшей над народом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после военной победы в подавлении тайпинов временно 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лась. В течение 10 лет после 1881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и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перепуганные военными кораблями и орудиями западных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считавшие «подражание Западу» своей спасительной «живой водой», начали создавать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и учебные заведения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моряков, посылать студентов за границу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дела и мореплавания, прокладывать телеграфные линии, построили кое-где небольшие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 В эти же годы появились и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обслуживающие население. Так были написаны первые строки в истории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Китае. За это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все усиливалась и расширялас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агресс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Китае. Особенно следует от-

метить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агрессию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Опорными пунктами агрессоров были церкви, а авангардом — миссионеры. Начав с приморских районов и бассейнов больших рек, агрессор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оникали в глубь Китая, они выпускали газеты, создавали учебные заведения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саждая рабскую идеологию среди широких мас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з дня в день усиливалась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агрессия, а правители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оказывали ей никаког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но даже,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отпирали двери и приглашали воров в дом» и «помогали тирану Чжоу в его злодеяниях».

Однако «подражание Западу», конечно, не могло ни укрепить силы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для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агрессорам, ни улучшить поло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вшееся бедностью и отсталостью. «Подражание Западу» — этим занималась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лика — лишь создавал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ам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вывоза капитала и увеличивало бремя народа. И усиливавшаяся, расширя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агрессия,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еще сильнее разжигала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борьб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годы после поражения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тяжелые удары п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нанесли отряды «Няньдан» («факельщики», повстанцы в Северном Китае) и поднявшиеся на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а и Юго-Запада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роме того, во всех провинциях страны непрерывно происходили народны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против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и против феодализма —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произвол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миссионеров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восстания. И вот «великое дел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о котором так шумели и которым так беззастенчиво хвастались правители 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быстро лопнуло, как мыльный пузырь.

Э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конечно, не могли не оказать глубокого и далеко идущего влияния на Лу Синя детских лет.

Затем, в юношеские и молодые годы Лу Синя, произошли одно за другим круп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 1894—1895 годов, «сто дней реформ» в 1898 году и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вооруженная борьба «ихэтуаней» в 1900 году. Эти круп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побудили еще большее число патриотов посвятить себ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му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движению. Молодой Лу Синь тоже включился в великую борьбу за спасение Китая. Однако Лу Синь уже тогда понимал чрезвычайную важ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Поэтому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тот период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был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е движения за новую культуру, за нов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и искусство. В своей статье «Сила сатанинской поэзии» Лу Синь знакомил китайских читателей с великими поэтами Европ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го и антифеодальн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и с их идеями, восхвалял их. А в «Зарубежных рассказах» он знакомил читателей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Европы XIX

века. Мы не должны умалчивать о том, что Лу Синь, как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пионер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деялся, что буржуаз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тип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сможет спасти Китай. Однако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в Китае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1911 года,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революция 1911 года не смогла выполнить сво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задачи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феодализма, заставил Лу Синя понять, что «этот путь»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он одно время переживал крайнюю душевную подавленность.

Орудийные залпы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донесли до Китая марксизм, и многие пионеры наш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увидели столбовую дорогу спасения Китая. Лу Синь был одним из них. Но путь о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емократизма к марксизму человек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за одну ночь, к тому же на этом пути он должен выдерживать испытание тяжелой борьбой. Наглядны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этого являетс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у Синя в течение десяти лет после 1919 года. Изучение процесса идей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Лу Синя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имеет для нас глубокое идейно-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Однако ограниченное время не позволяет мне рассказать в сегодняшнем докладе о процессе идей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Лу Синя — развития о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емократизма к марксизму, от теории эволюционизма к теории о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е (Здесь я хотел бы сделать небольшо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 В октябре нынешнего года исполнится 25 лет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Лу Синя. Пять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на собран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м 2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Лу Синя, я выступал с докладом на тему «Путь Лу Синя о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емократизма к коммунизму». Мой взгляд на путь идей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Лу Синя остался таким же, каким он был пять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 стоит пережаривать готовое блюдо», как у нас говорится). Сегодня я хотел бы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только на трех вопросах,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 акту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сегодняшней твор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овышения квалификации наш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а именно: 1)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лужил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делу в цел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у Синя; 2)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форма и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стил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Лу Синя; 3) о «широте» и «глубине» Лу Синя.

* * *

Лу Синь начал сво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примерно с 1903 года), но е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еще раньше. Его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Надпись к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портрету» (написанное в 1901 году) говорит о его решимости отдать свою жизнь Родине. Однако Лу Синь как литератор, мыслитель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начал свою революцион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ишь в период движения за новую культуру — движения «4 Мая» 1919 года. Накануне движения «4 Мая» он написал известный рассказ «Дневник сумасшедшего» (1918 г.), который был первой ласточкой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ервым цветк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у Синя. Впослед-

ствии в «Предисловии к сборнику "Клич"» (1922 г.) Лу Синь писал: «Стоило мне начать и все пошло вперед». 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не случайно. А в «Предисловии к «Сборнику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составленному автором» (1932 г.) он написал следующие строки: «Рассказы я начал писать в 1918 году, когда журнал «Новая молодежь» выдвинул лозунг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Это движение сейчас уже ушло в область истории, но дл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было несомненн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Лу Синь ничуть не скрывал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х целеустремленности в деле служения политике текущего момента. В этом же «Предисловии» он писал дальше:

«Мо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в журнале «Новая молодежь», в основном были созвучны с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и других авторов,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л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могли считатьс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и.

То были,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ледующ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указаниям». Но указаниям н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е доллара и не меча, а авангарда революции, которые я выполнял с уважением и по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желанию».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ледующ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указаниям», о которых говорит здесь Лу Синь,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ледующие указаниям революции, то есть та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оторых отображается борьба народа и дух эпохи. Литератур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идов оружия, используемого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е, и Лу Синь лучше других умел гибко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этим оружием, чтобы всемерно служить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работой над «Дневником сумасшедшего» Лу Синь начал писать «пестрые заметки» — фельетоны. Он творчески развил это оружие из арсенал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чав с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х заметок под общей темой «Различны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в журнале «Новая молодежь», Лу Синь вплоть до последней минуты своей жизни со всей страстностью разоблачал нечисть феодализма и подленцов-компрадоров (компрадорскую идеологию), которые обитали в то время под самым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ми масками, он писал под разными углами, используя самые различные темы, то выступая с острой сатирой или беспощадным обличением, то обращаясь к читателям с прямым призывом, то используя тонкие и умелые намеки. Эти «пестрые заметки», в которых Лу Синь полными жизненности штрихами создавал ярчайшие образы, выражал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глубокие идеи, которые западали в душу читателей и усваивались ими. Они наносили смертельные удары по реакцио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и сыграли огромную роль, вдохновляя и воспитывая широкие массы молодеж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стремившейся к истине.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 и страстны слова Лу Синя, сказанные им в 1915 году:

«Наши неотлож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заключаются, во-первых, в том, чтобы жить, во-вторых, — тепло одеваться и есть досыта, и в-третьих, —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Все, что будет лежать помехой на таком нашем пути вперед, мы должны беспощадно 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растоптать, будь то древнее ил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люди или черти, книги ли трех древних

императоров или там пяти императоров, взятое л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библиофила Хуан Пэй-ле или из библиотеки У Цяня,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ли «небесный нефрит» или вынесенный лошадейю из вод Хуанхэ легендарный рисунок, золотые ли статуэтки или яшмов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будды, пилюли или порошки,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ы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 методом, пластыри или папацы, 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по секретным рецептам» (*«Что вздумалось»*).

Решительно выступать против всех вещей, мешающих нашему прогрессу и развитию, — вот что занима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место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 духе Лу Синя, вот что проходит красной нитью через всю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у Синя. Вся жизнь Лу Синя и е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были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с националь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м движением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с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ой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во всех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нашли свое отображение могучие волны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Китае в период с 1919 года по 1936 год.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них отображена и длительная тяжелая борьба на фронте культуры, н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фронте, как одном из важных участко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борьба, которая шла извилистым путем, в которой были и фронтальные наступления и обходы с внезапными атаками. Острее борьбы направлялось то на одно, то на другое,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времени и места. Лу Синь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хорошо владел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м подходом к вопросам. Он указывал с большой остротой:

«Есл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литератор не хочет свое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помогать революции углубляться и развешиваться, а старае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революци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свою «литературу», то во время подъема революции он будет вредителем в теле льва. . .»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к «Книге о ложной свободе»*).

Лу Синь был против «искусства для искусства», указывая, что это лишь прозвание «развлекате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ласса помещиков и буржуазии. Однако он был также прот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ипа лозунгов и призывов», которая пренебрегает мастерств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типа лозунгов и призывов» не хватает силы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упрощенческого и вульгар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и применения принцип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лужат политике». С помощью та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икак нельзя достичь цел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лужат политике». Лу Синь подчеркивал: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коренной вопрос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является ли автор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м». Если да, то, о каком бы событии он ни писал, какими бы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он ни пользовался, все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буду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Фонтан выбрасывает только воду, а кровеносные сосуды — только кровь. «Стих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написанные по всем шаблонам и штампам» могут обмануть только слепых экзаменаторо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идавал Лу Синь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их специфичности как средства служения политике. Он про-

водил четкую грань между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и искусством и друг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статье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1928 г.) он писал: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с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несомненно,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пагандой, но не вся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Это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что все цветы имеют окраску (белый цвет я тоже считаю окраской), но не все, что имеет окраску, является цветком. Помимо призывов, лозунгов, воззваний, телеграмм, учебников и т. п. революция нуждаетс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что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и искусством».

Эти взгляды Лу Синя на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между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и искусством и политикой, на то,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должны служить политике, имеют для нас глубокое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 сегодня, а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лужат для нас хорошими образцами того,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должны служить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Он писал на самые различные те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 самые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приемы изображения. Число его рассказов невелико, но в них описаны самые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личности всех классов и всех слоев общества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казан духовный облик этих личностей. С созданными им живыми образами были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глубокие идеи самого Лу Синя. Еще больший диапазон имели его «пестрые заметки»: в них он говорил и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рошлом, и о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и о своей Родине, и о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ах, и о бесконечной вселенной, и о маленьком насекомом — в них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все. При этом все заметк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или косвенно, служили революции, накапливал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расширения и углуб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давал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молодому поколению богатую духовную пищу.

Говоря о своей твор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у Синь указывал на то влияние, которое оказали на него некоторые зарубежные классики и которое мы можем проследить в ранних рассказах Лу Синя. Однако рассказ «Дневник сумасшедшег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до того аналогич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еще большей глубиной, он и по стилю, и по духу является китайским, а не копией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рассказов. Лу Синь отмечал, что когда он начал писать, весь его «багаж состоял из сотни прочитанных ранее книг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писателей». Эти слова Лу Синь сказал не только по скромности, он со вс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стью заявляет нам, что перенимать все лучше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писателей, дабы обогатить свою кровь и плоть, не только можно, но 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лучших традиций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то Лу Синь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дчеркивал важность этой работы и сам отдавал ей много сил, о че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созданные и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деле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старых традиций взор Лу Синя охватывал многое. Лу Синь впитывал в себя лучш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прошлого и,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ясь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ой, обращался также к различным областям искусства. Так, в статье «Как я начал писать» (1933 г.) он говорит: